

肃宁杂技世家
皇帝御赐名号

杨静然 刘艳菊

走进肃宁县寺阁庄村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，各种杂技魔术表演道具一应俱全。这里是“京都双彩堂”传人葛群地的家。

听说记者来访，老人拱手抱拳：“各位辛苦了！”拱手投足间尽显侠义豪迈之气。随后，葛群地搬出家传的“宝贝”，那些碗碟箱罐，随便哪一件，都有至少二十多年的历史。岁月悠长，却无法湮没这些道具溢满华彩的传说。

随着他的讲述，我们得以了解老艺人传奇的一生，以及九代杂技世家背后的坚守。

御赐“双彩堂”

“‘双彩堂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号，满清时，那可代表着无上的隆恩浩荡，是我们葛家班拥有江湖盛名的底气。”62岁的葛群地提起自家的名号来，难掩骄傲。

那是清咸丰年间，葛群地的祖辈葛福君继承祖业谋生，带领自家杂技班走南闯北，在街巷表演卖艺。这一年元宵节，他们来到京城有名的黄村庙会，摆好了家伙什儿，葛福君便带领众弟子操练起来。

葛家祖上传下来的古彩魔术，光文武戏法就有80多种：“月下戏丹”“空盏取酒”“灯下火彩”等精彩绝伦的表演，引得叫好声不断，人们纷纷前来观看。表演还没结束，一位官人向葛福君走来，他说：“你们跟我去皇宫里表演，也让皇上看看这新鲜的技艺。”

葛福君虽是老江湖，但一听进宫给皇上表演，仍有紧张。在这位官人的再三劝说下，他才答应了下来。

从此，葛福君不再在庙会上卖艺了，找了家客栈住下，带着弟子们日夜排练，又改了串词和动作。平日里，民间街头嬉闹捧场的台词因为不雅，也被一一改换；他又现学了几句吉祥话，就如履薄冰地进了宫。

葛家班使出看家本领，表演了“吃糠吐火”“大变九莲灯”“九龙闹海”等10来个节目。其中“珠子灯”“水火凉庭灯”最出彩。

“灯里还有灯、灯里还有火，水火不相容，看得皇上直拍手称妙。一场演出使得龙颜大悦，除了重赏，又御赐我们堂号‘双彩堂’。”葛群地说，自古要把式卖艺的均属不入流的行为，少见招牌或者名号，但“双彩堂”可了不得，在京城皇宫为皇上表演，又得御赐堂号，一时间名震天下。

名号无价

从此，“京都双彩堂”的名号连同技艺在家族中一代代传承下来。其间，还有几个外姓传人，比如口技大师尹士林、“画眉张”等。

民国时，“双彩堂”第三代传人葛凤鸣机缘巧合收了江南口技大师尹士林为徒，授其飞手盗粮等多种文武结合的魔术技艺。作为交换，尹士林也将自己的口技传授给其子葛云贵。张增才是葛云贵的妻弟，由姐姐举荐葛云贵学艺谋生，又得尹士林真传，在郑州庙会曾与真画眉鸟对叫得

胜，故得艺名“画眉张”。葛云贵去世后，“画眉张”率领杂技团到寺阁庄，高声言道：“姐夫也是师傅，我会的活儿都是他教的。”

葛群地是“京都双彩堂”的第七代传人，他从小跟随父亲学艺，十几岁就登台演出，杂技、魔术于他是祖业，也是兴趣。他组建杂技团，长年奔波在乡间城市，多次应邀国外演出，最忙碌的时候一天5场演出，魔术变脸、滑稽小丑、口技、气功、车技等都是他的拿手绝活。

当年，葛家杂技团到处演出，艺人们饿了就啃几口凉饼，一般就是棒子面饼子萝卜条，赶到哪个村就在哪个村住下，屋里住不下，就住人家的柴房。

后来，杂技市场不景气，葛群地也改过行，但一看见电视上的杂技表演心里就发痒，又重操旧业。为了增强节目的观赏性，葛群地在节目编排、服装、道具上不断创新，只为了让更多人看到“双彩堂”的精彩。

每一次演出，不论国内还是国外，葛群地总是先自报家门——“京都双彩堂”的堂号。曾有一家南方魔术历史博物馆了解葛家的杂技历史后，斥巨资想买下这个堂号，却被葛群地拒绝了：“几辈人传下来的东西无价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卖。”

后继有人

在葛家院里，人人都能露一手，随手拿过一个物件都能耍起来。葛群地的妻子50多岁了，搬来木梯，用下巴就能顶起来；家里4个女儿，老大老三摆上凳子就能表演高难度的“飞机顶”……

但早些年，葛家却一直遵循着杂技“传男不传女”的家训。

2016年左右，葛群地和家人参加了央视三套的《向幸福出发》等栏目，让“京都双彩堂”广受关注。

“当时，栏目组的导演听说‘京都双彩堂’已经传承了八代，而且还有御赐的堂号后，非常惊讶。”葛群地说。

节目之后，葛家的老人逐渐转变了观念：“孙女也是葛家后人，更何况自己家的几个孙女都这么优秀。”

葛群地把祖传的演出道具拿出来，一一讲述给儿孙们。那些盘碗坛、铜钱、铜钱、铜钱，每一件都是历史。想当年，“京都双彩堂”的绝技有80种之多：“大变金钱”“帽妙鸡蛋”“九龙闹海”“灯下火彩”等，都是其他班子不能企及的绝活。“京都双彩堂”的堂号，更是祖宗留下来的基业。

没想到，孩子们都钟情于这门艺术，骨子里就有表演情怀。葛群地4个女儿，其中3个女儿、一个女婿都从事这一行当。如今，“双彩堂”已有了第九代传人。

这些年，“京都双彩堂”因精妙绝伦的表演一直颇受国内外的关注，更是频频亮相央视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杂技世家。



3月14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，因病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5岁。

2018年2月，央视《国家宝藏》第三期，当“妇好鸮尊”揭开神秘面纱后，记者曾采访过郑振香先生。在先生逝世之时，记者一行又一次来到先生的老家东光县，通过她的亲人讲述她倾情考古的光辉一生……

送别郑振香

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林永香 杜九升

北大考古系唯一的女生

走进东光县东光镇北街村，一提起郑振香，很多人都说：“那可是我们村的骄傲啊！为咱国家的考古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，对家乡人们也特别热情。”顺着村口的路，我们来到了郑振香的侄孙郑树谦的小卖部。说起自己的姑奶奶，郑树谦几次落泪。

郑树谦说，1929年10月，郑振香出生在东光县城老十字街东北角的“郑家大院”，后划定为东光镇北街村。

郑振香在家族谱名为郑镇香。其父郑式询，曾就读于南开大学，和周恩来总理是同学。早年存有和周总理同学时的合影，可惜“文革”初期丢失，郑家不少老人曾见过此照片。郑式询毕业后曾在保定、衡水等地任职，后因不愿为伪政府效力回家乡东光居住，上世纪70年代初病故。

郑振香有4个哥哥，一姐一妹，兄妹7人，是个大家庭。除了二哥郑镇疆和大姐郑镇艳二人早年过世外，兄妹5个都上过学。抗战爆发后，东光沦陷，大哥郑镇圻和三哥郑镇垣因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，先后选择了辍学，也因此终生务农。四哥郑镇坤曾是辽宁师范大学教授，退休后随儿子郑洪礼定居北京，于2022年7月去世。小妹郑镇芬在东光县直企业工作。家庭的影响和战争的磨砺，让郑振香从小就有一股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勇敢和坚定。

抗战胜利后，郑振香考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。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深造。1952年，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被取消，合并为历史系。她选择了当时极少有女性涉足的考古专业，成为那届考古系里的唯一女生。

当时，曾有人问她：“你一个姑娘家学考古，看到那些骨头不害怕吗？”她回答说：“不怕，在我看来，这些骨头就跟陶罐一样，没什么。”

从此，郑振香就和考古学结下了一生的缘。

1954年，25岁的郑振香本科毕业，留校担任助教，并于次年攻读北大考古专业研究生。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，让她选择了以商周考古为毕生的研究方向。

1959年，而立之年的郑振香研究生毕

业，当时她可以留校工作，而她毅然选择了去中国科学院（今中国社会科学院）考古研究所工作，当年便去了洛阳考古队任队长，并于1962年到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任副队长。从此，开始了她的考古人生。

直到2002年，因家庭原因，郑振香不得不离开考古第一线。算起来，先生在考古一线一干就是40年。40年间，先生亲历的重要发现不胜枚举，其中最重要的，莫过于“妇好墓”的发现与挖掘。

与三千年古墓的一场邂逅

2018年2月，央视《国家宝藏》第三期播出，“妇好鸮尊”也揭开了神秘面纱。记者为此采访先生，说到发现“妇好墓”，先生激动异常，音调随即提高，语速也快了起来。至今，犹在耳畔。

1975年冬，安阳小屯村西北角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“平整工地”的范围，为了防止殷墟遗址遭到破坏，时任考古队队长的郑振香立即带领考古队赶到现场。通过探杆钻探，在紧挨着一片棉花地的土层下竟真的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。经过相关手续的申报审批，郑振香和爱人陈志达、著名考古学家张之恒等人，于次年春天组成考古队，带人分头展开挖掘。

很快，郑振香队伍中有一位技工挖到了一个房基，在房基的正中位置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灰坑。郑振香很奇怪，立即亲自清理灰坑，随即一片长方形的红色夯土呈现出来，她用手一摸，发现这里的夯土又硬又厚，跟上面的完全不同。仔细查看夯土的残存边缘处，意识到，下面可能有墓穴。

随即，郑振香指挥技工们用探铲从夯土的边缘向下探去，可是当探杆加长了5米多，依旧触及的是坚硬的夯土。尽管如此，郑振香决心已下，一定要探到底！

那是1976年5月16日，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。那天上午，郑振香鼓励大家说：“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探到底！只要探到底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都是完成任务。”

可接下来的边缘钻探中，几个探孔都遇到了似石头的坚硬东西，打不下去了。先生当即决定选一些有经验的技工，把探杆再加长，在中心部位钻探。这是关键性一铲，也是决定性一铲。当探铲下探到8米

深处时，奇迹出现了，技工的探铲突然下陷了70厘米，接着又下陷了50厘米——硬底终于突破了。

“提上来吧。”随着郑振香的指示，手持探杆的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探杆一点点向上提。当探杆整个被提上来后，大家都惊呆了，只见探杆的铲子内沾满了湿漉漉的红色漆皮。

“是墓！”人们兴奋地叫起来。

这时，一个工人在铲子里发现了一件闪光的东西，清洗干净后发现，竟然是一枚玉坠。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，终于重见人间。

这是中国考古史上永远值得记忆的一天，也是郑振香先生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以郑振香为主的安阳考古队幸运地发现了“妇好墓”。

这是中国最早的女将军妇好的墓葬。出土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，其中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青铜器共有468件，三联甗、偶方彝、大铜钺等珍贵文物相继现世。过去只停留在甲骨文中的商朝王室生活突然变得真切起来。

“妇好墓”在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完整性和唯一性。上世纪30年代，殷墟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古今盗掘，因此人们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知之甚少。“妇好墓”作为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，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楚，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。

这一发现震惊了我国考古界，并被评为当年“世界考古十大发现”之一。

一生未育
把自己奉献给考古事业

在北京一个老公寓里，郑振香已经住了快30年。她说，搬进来的时候什么样了，到现在还是什么样了，家具从未换过。

也许在考古人心中，“古旧”并不是什么遗憾的事情。这个不大的单元房里，到处都堆积着倾注了她毕生心血的书籍和考古资料，因为记忆力不如从前，郑振香特意把商朝人物关系谱系图贴在卧室的柜子上。“忘了就看看，这是一种习惯。”

郑振香有很多日记本，其实那里记载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秘密，而是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和思考段落，不为发表，也不为给任何人看，就只是为了单纯的“掌握知

一张老药方 悬壶济世情

张彦龙

没想到，爷爷去世几十年后，他的这张药方，以这种方式到了我的手中。这也是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纸质药方了。我感慨万千，许多老人们的旧事也涌上我的心头。

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羊二庄前街村的人，都有很深的印象：在村里的主干道上，一位穿着长袍、头戴礼帽、拄着拐杖的老人，在晨曦或夕阳中缓缓独行。无论寒冬还是酷暑，每天总是如此——这就是我的爷爷。那时，他老人家早已退休，但放不下热爱的中医，更放不下救死扶伤的担当，于是退而不休，依然坚持按时上下班。有时下班回来，村里孩子们迎上前喊爷爷，他便从手提袋中拿出几块糖来分发给孩子们。日子长了，形成习惯，常常是一帮孩子们玩得正欢，突然有人喊一声：“张爷爷下班来了！”大家便一窝蜂地跑到街头，把老人家围起来。老人高兴地给大家每人发一块糖，街道上便升腾起一片欢声笑语。

爷爷是唐洼村人（今属中捷农场），生于1890年，幼读5年私塾，后学医6年，从此走上了行医之路。他老人家熟读医书，医术精湛，从医40多年，坚守悬壶济世、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，为人治病不分贫富贵贱，不论报酬厚薄、出诊路途远近，为百姓所称颂。他先后在青县马厂镇、黄骅羊二庄镇坐堂行医，字号“大仁堂”，四方百里有口皆碑。

听老人们说，1937年，青县马场一带疾病肆虐，三四天内，几十人发病，病人上吐下泻，几天就脱了形。老人家当时正在马厂镇行医。他决定义诊送药，济世救

人。他逐户巡诊开方，回到药铺把药配好，让徒弟送到病人家中，自己还要每天两次巡回复诊。3天后，大多数患者病情稳定，无人死亡。事后，当地百姓凑钱到大仁堂付药费，并千恩万谢，老人家分文不留。他说：“我在当地行医，多受各界关照。这次大家遇到困难，我理应尽到自己的心力。”

“盛字军”的一位杨副官深为感动，联合部分商绅人士共同赠匾致谢。木匾长两米宽一米，上书“医中国手，活我民众”8个大字。同时，杨副官还率领两位绅士到天津，向天津医药协会介绍爷爷的功德事迹，为爷爷申请了“中医药协会行医证书”。

有一年大年三十，爷爷出诊回家，听到西厢房有动静，开门一看，发现本村的一个孩子正在偷东西。那孩子一看被发现了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家人们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。爷爷知道这孩子没了父亲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便对家人说：“这孩子准是日子艰难，过不下去了。谁家好吃的东西三十还出来干这事？”他赶紧给孩子拿些包子馒头，让孩子回家和他娘过年去，并安慰孩子说：“别害怕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爷爷说。”还给了孩子一些钱，让他买个鞭炮，欢喜欢喜过个年。第二天，初一一大早，那孩子和他母亲来给爷爷拜年，千恩万谢“活菩萨”。

爷爷医术高超，与人为善，在十里八乡德高望重。平时看病，有钱拿药，没有钱的贫困户照旧拿药治病，而且服务照旧。纯朴的庄户人家，每当把药拿在手里，心怀感激的同时也会于心不忍打白条，留个欠账。日积月累，大仁堂每年

下下来积攒十几张欠账单。为免除欠费乡亲们的后顾之忧，每年腊月二十九，爷爷都会例行把欠账单烧掉，让困难的乡亲踏踏实实过个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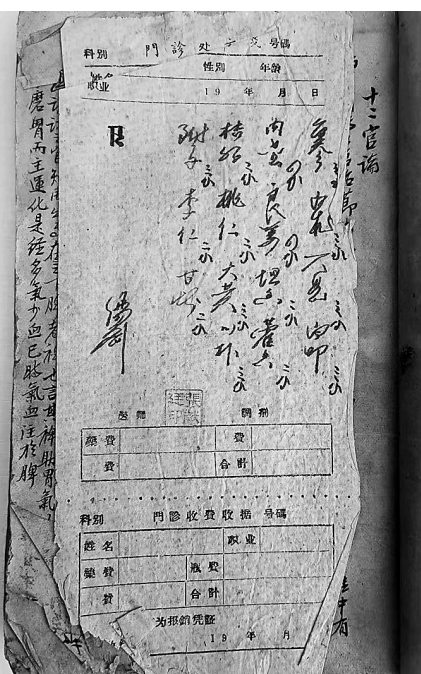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爷爷回到故乡行医，大仁堂设在羊二庄镇前街，行医为善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和厚爱。起初来到羊二庄是租赁的沿街房子，其间也曾变动搬迁过几次。1948年羊二庄解放实行土地改革，几位村干部商议，认为献廷先生为百姓造福，在前街无房无地，决定把一处房子分给他。爷爷召集家人统一思想，认为看病收入完全够得起房租，不需要再分房子，侵占贫下中农的利益。他再三向村干部表达感恩之心，谢绝了土改分配的房屋。

1953年，爷爷顺应政府要求，改变私人开业坐诊行医堂号，更名“大仁诊所”；1956年响应政府“公私合营”要求，积极参与建立“羊二庄联合诊所”，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“羊二庄镇医院”。1960年起，连续3年当选黄骅市人大代表。

1972年腊月二十六，爷爷因病去世。但他的医者仁心却一直激励着后辈。家族中有十几个人走上了从医的道路。今天见到这张药方，爷爷的笑容一下子涌到心头，老人们给我讲过的关于爷爷的故事，也像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闪现。我会永远把这些记在心里，并且传给我的孩子们——这可是我们家最珍贵的“传家宝”。

岁月悠悠

沧州往事



我的爷爷张献廷，当年在黄骅市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。老人去世时，我才10岁。50多年过去了，世事变迁，老人家留下的遗物已所剩无几。前几天，我忽然收到黄骅李维学老先生的一封信和一张发黄药方的信里说：“得知献廷医生是您祖父，甚是为您高兴，他老人家是名医，求医者甚多，四邻八方慕名而至，此方为我先父所存，是夹在一本中医秘方中保存至今。得有七八十年了，足见乡亲们对您张医生的信任敬佩和怀念。此幅方保存到现在，应该交给您留作纪念为好……”虽是老乡，但我与维学先生未见过面，他听人说起我的爷爷后，就把这张尘封多日的药方，专程托人送到了我的手中。